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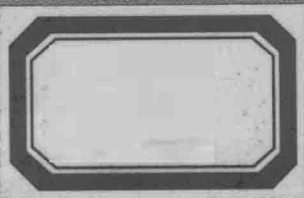
*A Documentary Review of
Tibetan Media (1951-2012):
Evolu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西藏藏语传媒的发展 与变迁1951-2012

赵靳秋 余 萍 刘园园 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



系(第三辑)

*A Documentary Review of
Tibetan Media (1951–2012):
Evolu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西藏藏语传媒的发展 与变迁1951–2012

赵靳秋 余 萍 刘园园 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藏语传媒的发展与变迁 1951—2012/赵靳秋,余萍,刘园园编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657-0820-6

I. ①藏… II. ①赵… ②余… ③刘… III. ①藏语—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0282 号

西藏藏语传媒的发展与变迁 1951—2012

编 著 赵靳秋 余 萍 刘园园

责任编辑 王雁来

责任印制 张 玥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820-6/G·0820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发展传播 /1

第一节 发展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及研究范式 /1

第二节 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 /6

第三节 发展观的演进与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实践 /11

第四节 课题的研究意义、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 /20

第二章 中国民族文化政策回顾 /2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文化政策 /28

第二节 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文化政策 /34

第三章 西藏自治区发展概况 /43

第一节 西藏概况 /43

第二节 政治发展 /49

第三节 经济发展 /53

第四节 教育发展 /60

第五节 卫生事业发展 /67

第四章 藏文印刷媒体的发展 /73

第一节 藏文报刊发展简史 /74

第二节 新世纪市场经济下西藏报业的全面有序发展 /82

第三节 当代藏文报刊体系 /89

第四节 藏文报刊、图书的出版印刷 /106

第五章 藏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 /128

第一节 西藏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 /129

第二节 西藏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建设 /153

第三节 西藏“西新工程”和电影“2131工程”的建设 /158

第四节 西藏广播电视的数字化 /165

第五节 主要藏语广播电台及电视台 /168

第六章 藏文媒体的网络化 /177

第一节 藏文信息技术的标准化 /177

第二节 西藏通信基础设施与互联网发展进程 /179

第三节 主要藏文网站 /185

第七章 综述:藏语传媒的发展与变迁 /201

第一节 新世纪的西藏藏文报刊体系 /201

第二节 藏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与变迁 /208

第三节 藏文媒体的网络化 /217

后 记 /222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发展传播

第一节 发展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及研究范式

发展传播的概念是北美传播学者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的,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技术和手段有效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发展传播学的研究焦点主要围绕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提出与演进深受同一时期发展社会学的影响,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大众传媒在推动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作用,而后者则强调将不同学科的发展理论整合起来,重视对社会整体发展的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发展社会学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① 与之相对应,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影响下,发展传播学研究也经历了现代化、国际新闻新秩序及多元论等不同阶段。^② 由于发展社会学与发展传播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以下的理论综述将二者合并起来探讨。

一、现代化理论

发展传播的早期启蒙著作主要针对媒体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确立

① 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3 页。

②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路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勒纳(Lerner)、施拉姆(Schramm)和罗杰斯(Rogers)等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即发展是将先进观念引入社会体系后所引发的一种社会变迁,其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来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①

勒纳强调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它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受到四项指标的影响,即城市化、识字率、媒体接触、社会参与(政治和经济)。这四项指标基本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系统的公共参与程度,即现代化程度。他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会带来识字率的提高,识字率的提高继而带动媒体使用的增加,频繁的媒体接触可以扩大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如选举和意见表达)和经济活动(如增加人均收入)的机会。^②

现代化理论认为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发展是通过引入技术以及在民众中培养某种观念、态度或行为而实现的现代化进程。^③勒纳认为,传播体系既是社会变革的标志也是动因。他指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需要培养一种“流动人格”(mobile personality)以适应向现代化的转变。^④“流动人格”是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观^⑤,具体指开放进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勇于尝试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地位、新角色,独立自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理想等。^⑥现代化流派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可以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催化

① Rogers, E. M. & Svenning, L.,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②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③ Melkote, S. R. & Steeves, H. L.,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 (2nd ed.)*, New Delhi: Sage, 2001.

④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⑤ 在书中,勒纳将“流动人格”又称为“精神机动性”(psychic mobility)或“移情能力”(empathy),这种现代性的人格促使人们产生脱离传统角色去担任新角色的愿望。

⑥ 夏文蓉:《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2007年中国传播学论坛会议资料集。

大批具有“流动人格”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关于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施拉姆也持有类似观点。在其所著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一书中,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通过传递知识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环境。他强调,只有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媒介具有潜在的教育功能,可以用来向人们传递先进的社会观念。而在这一点上,他与勒纳所提出的现代性不谋而合。^①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风靡一时,备受推崇。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积极邀请西方学者参与本地区的发展项目,希望借助大众传媒和变革机构的作用,引入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很多项目与农业技术有关,罗杰斯在总结美国农业推广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扩散模式,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功能,向落后地区普及推广新技术及新观念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农业改良的范本。

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现代化理论的推崇者所预言的跨越式发展。罗杰斯等人1976年也对自己先前的观点公开提出质疑,由此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猛烈的抨击。许多欧洲学者批判美国学者忽视了制约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制度等因素。^②一些现代化论的拥护者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摒弃这种“从上至下”的传播模式。罗杰斯承认在现代化理论盛行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③施拉姆也对西方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表示怀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环境,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想在几十年内达到西欧和美国三百年内成就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④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指出,要使发展传播和技术推广发挥效力,必须首先考虑

① Schramm, W.,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Hedebrö, G.,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Nations: A Critical Review*,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ervaes, J.,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Leuven, Belgium: Academische Cooperatief, 1983.

③ Rajagopal, S., "The Utility of Diffusion Research in the Third World: A Boon or Bane?", *Media Asia* 9 (1), 1982.

④ Schramm, W.,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1979.

其所服务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已有的经验表明,如果忽视技术承载的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单纯的技术引进是无法实现合理的社会变革的。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度的改进,发展传播只能巩固甚至加深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技术引进所连带的高投资和高风险剥夺了贫困阶层受益于新技术的机会,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① 罗杰斯指出,研究者应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采用适当的传播策略,使弱势群体同样能够从创新扩散中受益。^②

二、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

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依附性发展或有增长而无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③并反过来巩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优势地位。^④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面对贫富鸿沟拉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等与负债增长相伴生的问题,以此为背景,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并促成了依附理论的提出。该理论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学说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并借鉴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美国学者巴兰(Baran)和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h)等人的观点。^⑤

由普雷维什、弗兰克(Frank)、桑托斯(Santos)等拉美社会学家提出的依附理论把“依附”定义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和扩张。^⑥ 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是对依附论的一种改进和延伸。依附论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看作是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即强大和富有的核心国家对弱

① Goonasekera, A., "Third World Cultures and a New Information Order", In N. Jayaweera &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p. 61—75), Singapore: AMIC, 1987.

②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Y: Free Press, 2003.

③ 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由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南半球,所以这种差距也叫南北差距。

④ 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新闻大学》1996 年冬季。

⑤ 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4 页。

⑥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小和贫穷的边陲国家的侵占和盘剥,而对技术的占有程度是影响发达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欠发达国家处于边陲地位的决定性因素。^① 依附论者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发展,提出发展就是自力更生,不结盟以及建立世界新经济和信息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发达国家控制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分离出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②

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依附论并没有将传播看作是旨在改变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线性的信息传递,而认为传播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受全球和地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复杂过程。^③ 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依附论过分强调了制约发展的外因而忽视了对内因的考虑,诸如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政府对项目发展管理不善等问题。塞韦斯(Servaes)指出,就发展的含义而言,依附论和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因为两者都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④

三、多元论

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传播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引发了对发展的新认识,即70年代出现的多元论。多元论把发展看作是由广大民众参与实现的社会变革,主要通过民众中绝大多数对周遭环境掌控能力的增强来实现社会和物质进步(包括平等、自由和其他价值观)。^⑤

与依附论不同的是,多元论的倡导者认为发展的过程应该是多层面的,涉及国际、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面,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发展。多元论否认世界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国情

① Christopher, C. D. & Grimes, P.,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995.

②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③ Melkote, S. R. & Steeves, H. L.,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 (2nd ed.), New Delhi: Sage, 2001.

④ Servaes, J., *One World, Multiple Cultures: A New Paradigm on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Belgium: Acco, 1989.

⑤ Rogers, E. 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1), 1978.

寻求适合自身需要和目标的发展道路。^①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发展传播是一个由上至下的过程,大众传播媒体可以带来广泛的变化;多元论则强调信息的横向流动,重视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的作用。多元论认为信息由地方机构向政府机构散播,所以地方机构应该担负起发现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的重任。^②多元论发展观认为传播可以发挥多重功效,大众传播媒体、民间媒体、人际传播以及其他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都能够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发展规划。^③

尽管多元论为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局面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但该理论对民众参与和民主自由的推崇却源自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学者指出多元论过于理想化,他们怀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能否真正理解多元论学者们所主张的民众参与这一西方概念。^④

第二节 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

一、研究误区之一

发展传播学的提出者一直期望提炼出有关传播与发展关系的普适性理论,这种期待使研究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对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片面夸大了传播与传播技术在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①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② Melkote, S. R. & Steeves, H. L.,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 (2nd ed.), New Delhi: Sage, 2001.

③ Oepen, M. (Ed.), *Media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 a World of Change*, Bad Honnef: Horlemann, 1995.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④ Singhal, A. & Sthapitanonda, P.,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ed from a Critique of the Dominant, Dependency and Alternative Paradigm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1(7), 1996.

通过第一节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无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还是多元论,它们对于发展的概念以及传播的功能的理解,以及三大理论流派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况所提出的解决之道,既有其优点但也不乏局限性。由于各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政治与历史渊源,社会经济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把发展中国家当作一个同质性很高(即非常类似)的群体,在发展传播领域为这些国家找到“万金油”式包治百病的良方注定是无果而终的。发展传播学对普适性理论的追求低估了发展本身的复杂性。

学者奥基哥布(Okigbo)准确描述了发展传播学陷入研究怪圈而无法自拔的“窘境”:发展传播学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走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误区。原本希望从农业推广实践和知沟假说中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宏大理论来指导发展,但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一宏大理论一直没有问世。缺乏理论指导,后续的研究更加无序,直至研究者们放弃了对于发展传播理论的执着。^①

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例,该理论本身就隐含着推崇创新的偏见(pro-innovation bias)。扩散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或预设就是,变革机构推广的创新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会给采纳者带来便利或好处,由此忽视了新事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对拒绝或中断采纳,改进创新等行为的考察。为克服创新扩散理论的这一不足,罗杰斯认为,研究者应力求从受访者的角度看待和体会创新对于他们生存与生活的意义,深入了解他们做出采纳或拒绝采纳决定背后的动因。^②

学者加亚维拉(Jayaweera)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失误之处并不在于传播技术本身,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与先进技术配套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结构。换句话说,要使传播技术发挥作用,必须有先行的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③ 加亚维拉的观点得到了斯里兰卡学者古纳西卡拉(Goonasekera)的认同。古纳西卡拉认为,大众传媒是在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下运行的,因此受到价值观、社会分层、政治及经济冲突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把发展视为技术问题,而应将其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政府是

① Okigbo, C., "Is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Dead issue?", *Media Development*, 4, 1985.

②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Y: Free Press, 2003.

③ Jayaweera, N.,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Holistic View", In N. Jayaweera &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p. 76-94), Singapore: AMIC, 1987.

否拥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将直接影响到发展的速度与规模。^①此外,传播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过度夸大。学者克里普德福(Krippendorff)指出,西方学者习惯于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很类似的群体,在他们眼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被动并缺乏活力,因此非常容易接受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传播技术自然而然地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②

尽管现代化学派早在 70 年代就已经遭到反击和批判,但这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的思想在 20 世纪末依然盛行,甚至被带入 21 世纪。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等国际资助组织对于新信息通讯技术(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ew ICTs)重新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互联网等新传媒技术所提供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加亚维拉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警告:如果发展中国家把实现发展的愿望寄托在卫星通讯上,那么他们就是在重复 50 年代和 60 年代所犯的错误。无法通过广播和电视而实现的发展,卫星通讯技术同样无能为力。^③由此看来,发展传播学研究如果把注意力只放在技术上,却忽视发展面临的制度层面的制约,那么它将永远都是在兜圈子,而无法实现理论的演进。施拉姆指出,过去为发展设定预设模式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充分考虑并花更多功夫去了解和分析发展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复杂性。^④

二、研究误区之二

发展传播学深受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关注个体的行为变化,因此主要致

① Goonasekera, A., "Third World Cultures and a New Information Order", In N. Jayaweera &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ingapore: AMIC, 1987, pp. 61—75.

② Krippendorff, S.,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In J. A. Lent (Ed.), *Third World Mass Media: Issues, Theory and Research*, Virginia: Williamsburg, 1979, pp. 71—82.

③ Jayaweera, N.,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 Holistic View", In N. Jayaweera &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ingapore: AMIC, 1987, pp. 76—94.

④ Schramm, W., "End of an Old Paradigm?", In W. Schramm & D. Lerner (Eds.),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The Last Ten Years and the Next*, Hawai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onolulu, 1976, pp. 45—48.

力于建立传播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比如,创新扩散过多注重研究个体的社会特征(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等)和个性特征(性格等)对创新性的预测,而忽视了有关社会系统对扩散过程的影响。

发展传播命题中所蕴含的前提假设是,传播技术是引发和促成积极社会变革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发展传播学的经典研究大多受到实证主义研究导向的影响,旨在求证并预测传播与发展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观察与描述的基础上的。勒纳归纳的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与指标的发生顺序仅仅停留在假设的层面而未经证实。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当时提供的 54—73 个国家的数据,勒纳发现核心指标中两两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如媒体接触与识字率;识字率与城市化;识字率与投票率;识字率与人均收入等)(见图 1-1)。^① 遗憾的是,相关关系无法决定指标发生的顺序,因此也就无法预测孰为因,孰为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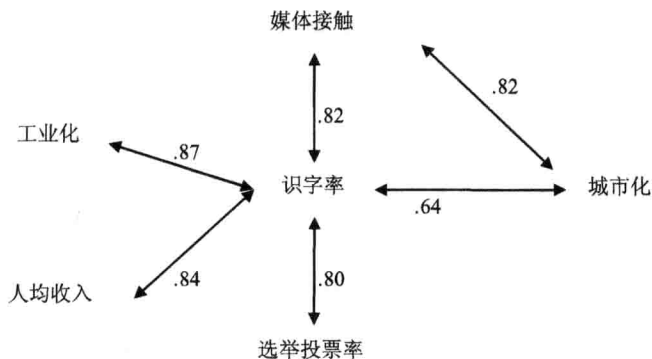


图 1-1 勒纳发现的现代化指标的相关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末,罗杰斯等构建了含有前因(antecedent)、中间(intermediate)与结果(consequent)变量的现代化模型,希望通过对多个农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分析为模型寻求数据支持。^② 罗杰斯等虽然能够证实变量间存在相关

^① Lerner,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② Rogers, E. M. & Svenning, L.,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关系,却无法控制变量发生的时间顺序,因此他们提出的现代化模型只能停留在未被证实的假设阶段。罗杰斯等不得不承认现代化可能是一个涉及多个变量的复杂过程。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反复使用的社会调查法不断受到质疑,下面我们以扩散研究为例,剖析社会调查法的应用缺陷。首先,社会调查法存在回忆失真问题(recall problem)。扩散研究常采用社会调查法,通过受访者的回忆来确定他们采纳创新的时间点。由于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记忆力等存在差异,这种依靠回忆所收集的数据,其可靠性必然值得怀疑。此外,在一次性调查所得到的截面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仅代表过去一个时间点发生的采纳行为。而创新采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一次性的问卷调查很难追踪和记录某项创新在社会系统中散播的进程。

还有,社会调查法无法帮助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扩散研究经常把采纳者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农场规模的大小及使用大众传媒的频数等当作自变量,采纳者的创新性当作因变量,由此得出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结论。也就是说,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农场规模越大,越见多识广,越早决定采纳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一次性调查无法在时间上保证自变量发生在因变量之前,因此相关分析的结果只能表明两个变量是否相互关联,却无法确定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罗杰斯建议通过在多个时间点进行多次调查或采用实验法来解决社会调查法无法解决的问题。^①

近年来,学者们依然没有停止对传播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索。为了求证信息通讯技术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2004年,郝晓鸣等对《2003 人类发展报告》中17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和人类发展各个层面^②之间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因此也就不能确定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该研究的结论是,信息通讯技术普及率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发

①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Y: Free Press, 2003.

② 测量信息通讯技术的变量分别是每千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测量总体人类发展水平的主要变量包括人类发展指数、成人识字率、教育指数和人口贫困指数等8个指标。此外,还有测量千年发展目标具体指标的11个变量。

展水平的指标,但现有数据无法证明这些技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①

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即对普适性通则以及因果关系的求证暴露了发展传播学学者对发展复杂性重视不足的弱点。加亚维拉指出,由于发展本身可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想要准确预测传播与发展或者发展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有可能无功而返。

第三节 发展观的演进与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实践

一、发展观的演进

发展传播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辗转在不同流派与思潮之中,“发展”的概念也随之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人类对发展的理解与认知并未停留在最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上,而是将其确定为包括经济、道德及精神层面目标的整体实现。

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观认为发展路径是单向的和不可逆转的,即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物质社会的过渡。20世纪60年代,人们主要通过经济增长指标对发展加以量化,将GNP作为度量发展的唯一尺度和指标。罗杰斯1969年为发展所下的定义是,通过采纳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②

依照现代化理论,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进口实施工业化发展,这些国家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民主充满极高的期望。然而,50年代短暂的经济复苏后,拉美经济立即陷入停止状态,一些国家被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贸易滑坡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困扰。随之而来的是政局不断替代,社会动荡。依附理论将发展中国

① 郝晓鸣、赵新秋:《信息通讯技术与人类发展》,载张国良主编:《中国传媒学评论(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0页。

② Rogers, E. M. & Svenning, L.,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家的贫穷直接归因于发达国家的剥削,而很少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因素。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高文盲率以及腐败等国内因素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贫困的重要原因。对发展本身的理解而言,依附理论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与现代化理论一样,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伴生的问题与弊端不断显现,如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对发展的理解也由此得到延展。1976年,在《传播与发展: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消逝》(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一文中,罗杰斯开始将社会与物质进步一并纳入发展的概念范畴,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于发展认知的逐步深入。罗杰斯认为,发展是一个广泛参与的社会变革过程,通过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周围环境掌控能力的增强,实现他们的社会与物质进步(平等、自由及其他价值观的实现)。^①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注重通过重新分配经济剩余,以平衡和缓解政治与社会经济层面的不平等现象。教育、识字率、健康、婴儿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指标开始纳入生活水平的衡量之中,发展这一概念被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涵。

从80年代开始,由于传统发展观伴生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种种问题,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研究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即便不断致力于推行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它们依然无法赶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元化理论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另一种发展”的概念,注重人权、平等、参与、民主与环境保护等基本需求的平衡发展,主张通过草根的参与和努力自下而上实现自主发展。“另一种发展”的主张向“人类发展”新发展观的提出又迈进了一步。

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著作《新发展观》,此书成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佩鲁曾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多“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1979年)的要求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

^① Rogers, E. M.,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976.